

当代汉语散文 流变论



• 袁勇麟 著



三联文博论丛

上海三联书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/袁勇麟著.
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2.6

(三联文博论丛)

ISBN 7-5426-1684-6

I. 当... II. 袁... III. 汉语-散文-文学研究-世界

IV. 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3343 号

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

著 者/袁勇麟

丛书策划/苏 梦

责任编辑/苏 梦

装帧设计/范峤青

责任校对/李京林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/sanlianc @ online.sh.cn

印 订/江苏省宜兴市教育彩印厂

版 次/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160 千字

印 张/8

印 数/1-3100

ISBN7-5426-1684-6

I·191 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总 序	钱谷融(1)
导 论 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	(1)
第一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学源流	(3)
第二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化语境	(11)
第三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体嬗变	(20)
第一章 中国大陆:散文的模式化与多元化	(1)
第一节 “颂圣试帖”与文化随笔	(2)
第二节 “双百”方针与散文复兴	(9)
第三节 散文的诗化与知识性杂文	(17)
第四节 八股圈外的杂文随笔	(24)
第五节 散文的中兴与多元化格局	(30)
第二章 台湾:“这是一个散文的世纪”	(47)
第一节 “战斗散文”与“闺秀散文”	(48)
第二节 散文革命与杂文变革	(50)
第三节 异军突起的乡土散文	(58)
第四节 消费环境下的散文创作	(63)

第五节 散文文类的开放与跨越	(70)
第三章 港澳:报刊专栏散文的兴衰沉浮	(77)
第一节 香港散文的奠基期	(79)
第二节 最具香港特色的“框框杂文”	(85)
第三节 困境中求生存的香港散文	(100)
第四节 日趋活跃的澳门散文创作	(108)
第四章 海外: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	(116)
第一节 海外汉语散文的重镇	(119)
第二节 学者型散文家的彩笔	(145)
第三节 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	(156)
结束语 “一个未被充分注意的重大现象”	(173)
附录一 反思与变革	
——’98 散文一瞥	(177)
附录二 散文天空中的思想星光	
——世纪末中国散文流向一瞥	(191)
主要参考书目	(208)
后 记	(213)

第一章

中国大陆：散文的模式化与多元化

当代中国大陆散文发展以 1976 年为界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1949 年至 1976 年的 27 年间，散文创作经历了所谓“复兴”、“丰收”和“空白”几个时期，由于当时思想文化封闭，个性意识丧失，散文从内容到形式大都过于循规蹈矩，日趋模式化。而且由于“工具论”、“武器论”、“轻骑兵说”、“形散神不散”等框框套套的束缚，导致散文严重异化。因此，曾经在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、被鲁迅认为成就“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^① 的散文小品，此时已失去往日的风采，再也没有出现朱自清当年所描绘的现代散文的繁荣景象：“有种种的样式，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、批评着、解释着人生的各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：有中国名士风，有外国绅士风，有隐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写，或讽刺，或委曲，或缜密，或劲健，或绮丽，或洗炼，或流动，或含蓄，在表现上是如此。”^② 这种生动活泼、异

① 鲁迅：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，原收入《南腔北调集》，见俞元桂主编《中国现代散文理论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版，第 71 页。

② 朱自清：《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》，原载《文学周报》第 345 期，同上书，第 408 页。

彩纷呈的散文创作局面,只有在新时期的文坛中才又重现,甚至有了新的突破。许多散文家不仅走出杨朔、刘白羽和秦牧的“三家模式”,而且也不满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“百家手法”,他们主张要创造出“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琳琅满目的新文体、新形式来”^①。

第一节 “颂圣试帖”与文化随笔

共和国初期的散文,是在继承“延安散文”^②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表现“新的世界”和“新的人物”要求文学具有“颂歌”的基调。1951年8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斯大林给杰米扬·别德内依同志的信》的中文译文,斯大林直截了当地给作家艺术家规定的任务是充当“先进阶级的歌手”。散文因为短小灵活,在配合政治任务,表现新人新事,讴歌英雄模范方面,更是发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。汪曾祺在《当代散文大系总序》中指出,50年代的散文,“不管什么题目,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,歌颂社会主义,卒章显其志,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,最后一句总要颂圣”。而且,这一时期

① 斯好:《散文需要新的思考、新的活力》,《散文百家》1992年第7期。

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故余树森教授认为,所谓“延安散文”,乃是特定的政治、文化、历史、地理环境里所产生的一个散文现象,它具有“光明、乐观的颂歌基调,朴实、浓厚的生活气息,鲜明的时代精神,刚健的战斗风格,客观写实的体制”等审美风范。见余树森、陈旭光:《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,第5、13-14页。

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“通讯”、“报告”、“特写”的格局,纪实性散文多,狭义的抒情散文,或曰“美文”、“艺术散文”少。于是最被认可的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通讯报告的色彩,50年代初最著名的散文就是魏巍的朝鲜通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,此外如巴金的《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》、菡子的《从上甘岭来》、臧克家的《毛主席向着黄河笑》、老舍的《我热爱新北京》、李若冰的《在柴达木盆地》、叶圣陶的《游了三个湖》、曹禺的《半日的“旅行”》、杨朔的《滇池边上的报春花》等等,都是以客观的纪实或叙事为主。当时权威的散文选本也大都冠以“散文特写”的名称,如1956年中国作协编选的第二次文代会以来(1953.9—1955.2)优秀作品选集《散文特写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;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特写选(1956年)》;1959年严文井主编的《1949—1959 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·散文特写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),《新观察》编辑部编选的《散文特写选(1958年)》(作家出版社),四川人民出版社的《四川十年散文特写选(1949—1959)》;196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《山西散文特写选(1949—1959)》,敦煌文艺出版社的《甘肃散文特写选(1949—1959)》,东风文艺出版社的《散文特写选》(延河文学丛书);1963年周立波选编的《散文特写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,北方文艺出版社的《黑龙江散文特写选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的《四川散文特写选》;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《萌芽散文特写选》;以至于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选编建国30年来散文作品选时,还是取名《1949—1979 散文特写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。

人们在评价5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时,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家“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,并且过于将散文混

同于一般的通讯报告,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位”^①。其实这只是看到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下的散文创作情况,而在文坛边缘,一些曾经有过“不光彩历史”的人如“汉奸文人”周作人、“鸳鸯蝴蝶派作家”周瘦鹃等人的“民间创作”,却长期以来为文学史所忽视。这不仅仅是一种“疏漏”^②,更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知识话语的霸权中所形成的散文观对“民间散文”的漠视。

周作人从1949年11月22日开始至1952年3月15日止,以申寿、鹤生、十山、荣纪、持光、木寿、祝由、木仙、龙山等笔名,在上海的小报《亦报》副刊“隔日谈”和“饭后随笔”栏中,发表了908篇随笔小品,另外从1950年1月10日至3月27日,还在另一份小报《大报》上发表了43篇随笔小品。其中除一部分是回忆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,曾结集为《鲁迅的故家》和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出版外,其余大部分文章当时均未结集出版。由于《亦报》、《大报》在文艺界、学术界影响不大,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。直到1988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《知堂集外文·〈亦报〉随笔》一书,才使这些散文重见天日。但令人不解的是,此后出版的几本当代散文史论著如《中国当代散文史》(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)、《中国当代散文史》(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)、《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》(北京大学出

① 周海波:《论中国现代散文从叙事向抒情的转换》,《齐鲁学刊》1998年第6期。

② 倪墨炎认为:“周作人的这些发表在《亦报》、《大报》上的‘夜报小品’,是他的散文创作的新的发展。在当代散文艺术的研究中,无视周作人的这些小品,恐怕是一种疏漏。”见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:周作人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,第453页。

版社 1996 年 8 月版)和《中国当代散文之审美建构》(海天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版)等,均无一字涉及到周作人的这些散文作品。

周作人在《亦报》、《大报》上写的这些随笔小品都非常短,每篇大约五六百字。他自定两个标准:“一是有意思,二是有意义,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。”^①周作人丝毫不鄙薄这些短文的写作,他说:“从前杂志和报章上,有设杂感录这一栏的,长的可以有一二千字,短的几百到几十字,却很有力量,《新青年》上这与通信都很着重,对于旧势力的战斗往往在那里展开来,比长篇大文更为得力。我们现在写的小文,统系上可以说从那里来的,就是战斗性渐减少了,篇幅的短本来合格,……”^②他的这些随笔小品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,天文地理,花鸟虫鱼,三教九流,衣食住行,无所不谈。从“梅兰竹菊”到“龙凤龟麟”,从《艳史丛编》到《聊斋志异》,从“日本民谣”到“苏北小调”,从“南北的点心”到“男女的装扮”,从“活无常与女吊”到“汤婆子与脚炉”,从“街坊上的悲喜剧”到“打油诗的文字狱”,从“俗谚的背景”到“师爷的笔法”,从“夜读的境界”到“文章的包袱”,周作人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内,随手拈来都是题目,也都是文章。钟叔河认为:“这类文字,不谈大道理,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,娓娓道来,情理自见。它们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,同时又吸取了欧洲 18 世纪随笔文(essay)的特色,……

① 周作人:《拿手戏》,《知堂集外文·〈亦报〉随笔·序》,岳麓书社 1988 年 1 月版,第 437 页。

② 周作人:《短文章》,同上书,第 677 页。

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。”^①周作人自己也说他的这些随笔“原以识小为职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，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，不怕琐屑，只要真实，不人云亦云，他的价值就有了”^②。

周作人的“亦报随笔”朴实自然，语言俗白、纯净而有韵味，没有了三四十年代《夜读抄》、《书房一角》“掉书袋”的沉闷。而且，这些数以百计的随笔小品，没有固定的程式，没有令人生厌的“讲台气”，总是开门见山，深入浅出，“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”，“如日记尺牋那么诚实”，一副“家常面孔”^③，因此，读来使人倍感亲切。如《磨墨》：

写字磨墨是小事情，虽然古人有句云，非人磨墨墨磨人，天天磨墨，十年中用不到多少块，人却要老得多了。这是事实，但也是诗人感慨之谈，若说磨墨是小事，那还是的确的。话虽如此，尽管是小事情，却也颇有讲究，记得袁子才有两句诗云，印贪三面刻，墨爱两头磨，说的是文人常态，我却很有点讨厌，并不是附和心正则笔正的迂论，只觉得这是太乱来，有如纸写反面，信封倒用，歪戴帽，不系纽扣，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，总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表示。我有两个朋友都是书家，他们用墨很是用心，磨的平正不必说了，甲君写屏对往往自己磨上半天磨，不假手于人，乙君磨了之

① 钟叔河：《知堂集外文·〈亦报〉随笔·序》，岳麓书社 1988 年 1 月版，第 3-4 页。

② 周作人：《关于身边琐事》，同上书，第 99 页。

③ 周作人：《真心话》，同上书，第 655 页。

后用纸将湿墨拭去，省得堆积胶着，这未必于书法有何益处，但那种整洁的作法总是可取的。书房里的学生习惯不好，常把墨磨得成尖角，或是两面侧着磨，结果是剑口似的，这些小事情也于蒙养有关，应当及早纠正，因为袁子才的那种做法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

在这篇短短不到 400 字的文章里，周作人写得从容自如，没有受篇幅限制而产生逼仄感和拘束感，若非大手笔是很难做到的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周作人写得风趣盎然，字里行间闪烁着幽默的火花，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。

当然，周作人的“亦报随笔”也有不足之处。由于写作频繁，《亦报》起初隔一天一篇，后来每天一篇，有时甚至一天两篇，周作人深感捉襟见肘，每每抱怨“文思枯竭”^①，“抓不到题目”^②，“苦于缺乏题材”^③，文章不免越写越难。再加上经济目的成了周作人此一时期随笔写作的主要动因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写这类文章是“以工代赈”^④。因此，他的不少随笔小品尽管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，文字也仍有过去的流风余韵，可是读起来总觉得缺少一种内在的神采，甚至于“不是乏味便多生凑”^⑤，不及“五四”时期他的那些“美文”绚丽多彩。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才能，实际

① 周作人：《宣传婚姻法》，见《知堂集外文·〈亦报〉随笔》，岳麓书社 1988 年 1 月版，第 745 页。

② 周作人：《没有题目的文章》，同上书，第 313 页。

③ 周作人：《渡船问题》，同上书，第 692 页。

④ 周作人：《谈天》，同上书，第 59 页。

⑤ 周作人：《拿手戏》，同上书，第 437 页。

上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。

周瘦鹃建国后长期以大量精力从事园艺工作,是江南著名的园艺家。他在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之余,写有大量治艺小札和风物小记,小巧玲珑,清新婉约,高雅闲适,别具一格。50年代周瘦鹃出版了散文集《花前琐记》、《花前续记》、《花花草草》等。

周瘦鹃的随笔小品并不追求什么重大题材、重大主题,他说:“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而外,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,简直是无所不谈。”^① 他的花草随笔多不胜数,如《山茶花开春未归》、《杜鹃花发映山红》、《国色天香说牡丹》、《梅花时节话梅花》、《一生低首紫罗兰》、《一年无事为花忙》、《忽见陌头杨柳色》、《最是橙黄桔绿时》、《花雨缤纷春去了》、《柿叶满庭红颗秋》等,出之自然,挥洒而成,篇幅短小,清灵秀丽。尤其是周瘦鹃博览诗书,他在随笔小品中常常广征博引,将历史、民俗、典故与古诗词熔铸于一炉,涉笔成趣,给人以知识的魅力和闲谈的情趣。如《得水能仙天与奇》一文,先介绍水仙的形貌特点、产地以及不同品种的区别,中间叙述了关于水仙的神话传说:“据说华阴人汤夷,服水仙八石为水仙,即名河伯。谢公梦一仙女赠与水仙一束,次日生一女,长而聪慧工诗。姚姥住长离桥,寒夜梦见观星落地,化作水仙一丛,又美又香,就吃了下去;醒来生下一女,稍长,聪明能文,因名观星,观星即是天柱下的女史星,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,又名姚女花。”全文不到一千字,却征引了宋代刘邦直、元代陈旅、袁士元、丁鹤年,明代王谷祥、文征明和清代金逸、龚自珍等咏叹水仙花的诗赋,“雅韵欲流,足为水仙生色”。

① 周瘦鹃:《花前琐记·前言》,通俗文艺出版社 1955 年 6 月版,第 2 页。

周瘦鹃的随笔小品虽然貌似山野自生的闲花野草，但是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：“愿君休薄闲花草，万国衣冠拜下风。”

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对散文的多本质性缺乏理解，排斥大量知识性、闲适性和趣味性的随笔小品，把它们当成资产阶级的“闲情逸趣”而否定禁绝了。周作人和周瘦鹃等人的随笔小品被长期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只有到了新时期，先前恶性发展到偏执狂热的极“左”政治意识被广泛宽松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所取代，海阔天空、纵意而谈的文化随笔小品才日渐兴盛起来。唐弢在1982年曾指出：“有人提出所谓学者的散文，就是那种笔记式的和随笔式的散文，我以为都可以写，海阔天空，古今中外，什么都谈，有的是掌故考证，有的是生活漫谈，类似英国的所谓 familiar essay，信手拈来，娓娓而谈，使人觉得亲切，有味，可以有益，也可以有战斗性。”^①

第二节 “双百”方针与散文复兴

50年代中期，大陆文坛曾出现过“复兴散文”的运动。大概鉴于建国初期“精心写作美文的传统，我们继承和发扬得似乎尚不够；散文作品中可以称得上美文的，毕竟还不算多”，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，在1956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“双百”方针后，“多次呼吁‘复兴散文’，他再三强调要继承‘五四’以来散文随笔的优秀传统，还特别指出要提倡美文”^②。尤

① 唐弢：《对杂文的几点意见》，《新观察》1982年第24期。

② 袁鹰：《散文求索小记——写在自选集前面》，《收获》1982年第6期。

其是胡乔木主管的《人民日报》一改过去生搬苏联《真理报》没有副刊的做法,于1956年7月1日创办了文艺副刊,并在当天刊登稿约,具体内容如下:

一、短论、杂文、有文学色彩的短篇的政论、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;

二、散文,小品,速写,短篇报告,讽刺小品,有文学色彩的游记、日记、书信、回忆;

三、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,关于历史、地理、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;

四、短诗,民歌,寓言,故事,短篇小说,短剧;

五、读书笔记,短篇的书评、剧评、影评、美术评论、音乐评论和其他文学艺术的评论;

六、小幅美术作品。^①

这个在胡乔木直接过问并改定的稿约中,尤其突出散文的地位,其中第一、二、三、五条都是有关散文。而且,胡乔木还帮助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拟定一份作者名单,除文艺圈和文化界的作者外,他还提到李锐、刘祖春、张铁夫和曾彦修等党政干部;他也没忘记那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、忽视甚至已经被遗忘的作家,如沈从文、张恨水、徐凌霄、徐一士和周作人。^②于是,《人民日报》文艺副刊在初创到1957年“反右”前夕的近一年时间里,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新人的散文、随笔、小品和杂文,一时

^① 见《副刊需要哪些稿件?》,《人民日报》1956年7月1日。

^② 袁鹰:《我所接触的胡乔木》,《上海滩》1995年第2期。

间异彩纷呈,大有“山阴道上目不暇接”的景象。余树森认为:“《人民日报》可谓开风气之先者,其文艺副刊成为培养散文鲜花、新苗的沃土和园地。不少传诵一时的好散文均出自这片沃土,像白桦的《洛阳灯火》,万全的《搪瓷茶缸》,何为的《第二次考试》,梅阡的《春夜》等等。”^①正是由于《人民日报》观念上的导向,使散文创作在1956年下半年明显地出现了转机,“艺术散文和杂文(小品)在建国后第一次生动地勃起。周立波的《灯》,老舍的《养花》,杨朔的《香山红叶》,秦牧的《社稷坛抒情》,葛洛的《龙店乡的喜日》,姚雪垠的《惠泉吃茶记》,魏巍的《我的老师》,丰子恺的《庐山面目》,菡子的《小牛秧子》,万全的《搪瓷茶缸》,徐迟的《归来》,徐开垒的《竞赛》等,都写在这一时期。这些散文,其思想的活泼程度、文笔的洒脱情况,在十七年间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”^②。因此,“1956年仿佛是一座分水岭,标志着我国当代散文审美层次的第一次升华和飞跃”^③。

在这一次短暂的“复兴散文”的运动中,艺术散文方面,叶圣陶、郑振铎、许钦文、丰子恺、老舍、巴金、李广田、李霁野、方令孺等老作家生机焕发,他们的散文既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,又保留着“五四”散文传统的流风余韵,对正处于审美调整中的散文创作,无疑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。而郭风、何为、菡子、柯蓝、李若冰、林遐、杨石等一批散文新人则在此散文环境的培育、熏陶下迅速崛起,奠定了他们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。另

① 余树森、陈旭光:《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》,第36、37页。

② 溪清、渝嘉:《当代散文创作纵横谈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1期。

③ 同②。

外,与建国初期散文特写多表现国际国内大事、描绘时代风云人物相比,这一时期的艺术散文创作开始注意对个人所独有的见闻、感思的抒写,散文作者的审美观照也向周围的平凡细小事物转移,诸如灯火、茶缸、红叶、吃茶、养花之类的题目常见诸报刊,而且艺术散文逐渐由叙事体制向抒情体制转变,散文家的文体意识也有所加强。当然,鉴于50年代中期特殊的政治、文化背景的制约,这次“复兴散文”运动只是赢得散文美学特征的部分回归。随着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、1958年“大跃进”运动的开展,散文创作重新陷入困境。

与艺术散文的短暂兴起相一致,杂文也在继承和发扬“五四”以来杂文传统的基础上,迎来了建国后第一次创作高潮,而且似乎杂文比艺术散文取得的成就为大。黄秋耘说:“五十年代前期,举国一致地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,人人都丹心似火,壮思欲飞,随着‘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’口号的提出,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文学家更感到创作和言论的自由,寓意抒怀,无所顾虑,尤其是杂文的创作,更是笔气纵横,豪情洋溢,佳作纷呈,名篇迭出。”^①

改版后的《人民日报》同样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,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。据当时担任《人民日报》杂文编辑的蓝翎统计,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,不到一年时间里,《人民日报》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,发表杂文500多篇,作者200余人。篇目之多,作者之众,影响之大,实属空前。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巴金、老舍、艾青、夏衍、

^① 黄秋耘:《天下有道则庶人议》,见《当代杂文选粹·黄秋耘之卷》,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,第106页。

田汉、何其芳、巴人、徐懋庸、邓拓等都参加了杂文创作，还有一批刚学写杂文的“小字辈”如邵燕祥、唐达成、鲍昌、蓝翎、邓友梅、焦勇夫、陈泽群以及姚文元等，也加入杂文创作队伍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带动和影响下，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报·晚刊》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长江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新观察》等报刊也相继开辟杂文专栏，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杂文篇章。而且更为难得的是，许多文学刊物开始重视发表杂文作品，《人民文学》设立“短论”、“杂文”专栏，《新港》开辟“自由谈”和“无花的蔷薇”专栏，《边疆文艺》设有“评论·随笔”专栏，《辽宁文艺》设有“杂感·小品”专栏，《贵州文艺》设有“杂谈·随笔”专栏，《陕西文艺》设有“漫谈·随笔”专栏，《星火》设有“啄木鸟”专栏，《蜜蜂》设有“百花丛里”专栏，《雨花》和《奔流》设有“杂感·随笔”专栏，《东海》设有“杂文·寓言”专栏，《山花》设有“短论·杂文”专栏，等等。可以说，杂文已经“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”。

徐懋庸和巴人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两为杂文家。徐懋庸说，建国后由于“气候的关系”，他“噤若寒蝉”^①，直到1956年7月，“《人民日报》改版，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，我在汉口，读着读着，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，现在的杂文，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，于是寄了一篇去”^②。这就是他以“弗先”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《想到〈活捉〉》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编辑的鼓励下，徐懋庸把积压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形诸笔墨。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8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，徐懋庸以弗先、回春、徐选牲、彭鼎、王纬、万松、樊康、劳于农等笔名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

① 徐懋庸：《“蝉噪居”漫笔·序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57年第7期。

② 徐懋庸：《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57年第7期。